

通俗小丛书

向警予烈士在武汉

黎少岑写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向普子烈士在武汉
集少年军
德 警械司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武汉市书刊出版发行公司

湖北省新华书店

汉口新华印务厂

1972年1月第1版 197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0册

开本 880×1230mm²

印张 12.5

字数 350千字

封面设计 陈鹤良

责任编辑 陈鹤良



向警予烈士

在工人中間

在1927年“武汉政府”时期，汉口左益街尚德里內面的老4号房子里，是住的中共中央的一个机关。尚德里对面的几栋楼房，是全国总工会、湖北省汉口市总工会和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（当时的負責人是共产党员）的所在地。那里是当时武汉的一个革命中心。

当时武汉的工人运动，在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，发展很快，工人纠察队也組織起来了。在收回“租界”和保卫武汉的斗争中，表現出了工人阶级的偉大力量。

向警予烈士是这一年4月間到市总工会来的。当时她剛从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回来，出国已經有一年多了，但她很快便熟悉了工作，熟习了同工作有关的人。她在市总工会是担任宣传部的工作。看样子她是个斯文

象，做起事来却象生龙活虎一般，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那股干勁。她总是开了会便去写东西，写完东西又去找工人談心、談工作，一刻也不休息。当时工会出的一些宣傳品比較通俗易懂、生动有力，对发展工人运动和教育工人，很有作用；这其中有些便是向警予烈士写的。

人們一提起革命家庭来，就会举向警予做例子：她的爱人蔡和森，当时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，蔡和森的妹妹蔡暢和妹夫李富春，也是著名的共产党员。人們一提到共产党员沒有地位觀念，也是举向警予为例，大家都知道她原来是在中共中央負妇女工作总責的，对于把妇女运动引到革命道路上来，起过卓越的作用。現在党叫她到一个市总工会里作部門工作，她却还是一样干得很起勁。

党派向警予到工会里来工作是有道理的，这說明了武汉工运工作的重要；她在法国的紡織厂和橡胶厂作过工，有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感情，和工人在一起能有共同的语言。在1922年到1925年間，她担任妇女工作，就能和工人打

成一片；她不只是自己时常到工厂里去和工人們談些知心話，还鼓励知識界的妇女和女学生们也都去到女工和农村妇女中工作。

她的这种关心人和关心集体的高貴品質，从她青年时代的活动中便可以看出来。学生时代，她在湖南先后讀过第三女师、第一女师和周南女校，早在“五四”运动前，就是一个有名的学生运动的領導者；她发表反帝反軍閥的演說时，道理明确，言語通俗，群众听了，沒有不受到感动的。毛主席組織“新民学会”和倡导留法勤工儉学运动，她都参加了。她曾經在她的故乡溆浦县創办了一所男女合校的小学；她反对当时那种体罰学生、片面要求学生“尊师重道”的提法，主張师生應該互相热爱，應該是“尊师爱生”。

她回武汉不久，党在武昌都府堤旧高师附小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她在大会中很主动的去关照一些女工代表，帮助她們熟习文件，鼓励她們前进。工人們知道她是个知識分子，而且是个从外国留学回来的大知識分子；

但却看不出她有那种所謂知識分子的架子。她真的是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，說話能說到工人們的心坎上。

不久，她从市总工会調到汉口市委去了，仍然在宣傳部工作；她这时对党所领导的工会工作，还是和过去一样注意了解和帮助。她非常注意对工人进行教育，她在上海工作时，便发展过工人夜校。当时武汉的工人学校还很少，不适应30万工会会员的需要；到大革命失败前夕，市总工会大招工人学校的教員，准备再添办一批工人学校，可惜沒等到学校开办，反动軍閥李品仙便将总工会占领了。

我当时就曾应聘为工人学校教員，我想这增办一大批工人学校的决定，多少与向警予烈士有关。由于时局的变化，我同时收到审查合格的通知与停办工校要退回象片、証件的紧急通知，等我赶到市总工会时，那里再沒有和藹可亲的面孔了，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人。象片、証件也沒有退还給我。过不几天，汉口市学联主席何世昌到汉口市党部来，因为里面換了

人，他被捕牺牲了。一直到解放前夕，友益街的这几栋楼房，都是給反动机关霸占着，拿他們的殘暴行为，沾污这一帶有着光荣历史的地方。

堅持地下工作

向警予烈士調到市委工作后，同样注意对黨員的教育工作。她积极参加組織各种訓練班和編輯訓練班的教材工作，她还經常通过参加各工厂支部會議和个别談話，来提高黨員和工人群众的認識水平。她日夜不停的工作着，有时連飯都顧不得吃，甚至半夜里还赶到工人或学生宿舍中开会或談話。

1927年7月間，汪精卫同蒋介石一样，也叛变了革命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，禁止一切革命团体活动。党和工会活动就轉入到地下了。这时，党为了繼續领导群众进行斗争，决定向警予还是留到武汉工作。她在过去短短的3个月中，同群众建立了血肉相連的关系，

她也舍不得离开这里，所以她非常高兴的接受了組織上的决定。以后，她穿上一件普通的旗袍，还是照样到处奔走，想各种方法保全組織，发动群众繼續斗争。她絲毫也沒有想到危險，只是想到怎样把革命坚持下去。她的身体过度疲劳，变得非常瘦弱了，有时只吃一个餅子也过一天，但她还是不休息的工作。

汪精卫叛变了革命之后，陈公博便派“改組委員”接收了各級工会，那些工会“改組委員”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人，是工賊，人們称他們为“改組派”。30万有組織的工人，不是一下子便能拆散得了的，在“八一”南昌起义的第三天，武汉的車工便宣布过同盟罢工，反对屠杀。当时汉口“車俠工会”不仅被改組派占去，而且还被开枪打死、打伤工人和搶去会費，車工同盟罢工也就是这样激起来的，結果爭得了交还会址。一开始是两种工会并存，真的工会轉入地下，或另外找了工会地址。随后由于改組派与反动派里应外合的迫害，有些工会負責人被捕、牺牲了，有的轉移了，有的失了业，处于

飢餓状态中。工会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就几乎是完全断絕了，工会不能不几乎和党一样的秘密起来。党通过原有的工会骨干，来联系工人群众，就更困难了，向警予烈士到礄口等地工厂区域，只有跑得更勤，她不顾一切的要使党的工作和广大的工人群众紧密联系起来。

自武汉陷入白色恐怖，一些厂主和店主便开始向工人进攻，首先是取消工人在大革命期间所争得的一些权利，并解雇工会负责人员；武汉的工人生活，这时又变为同过去一样的受压迫、受痛苦了。

武昌武胜門有个震寰紗厂，在这一年11月間，資本家无故开除了剪发女工；看来这还只是反动派的第一刀，如果不加反抗，还会繼續开除一些工人的。党首先組織了各界妇女去震寰紗厂进行宣传和慰问，支援被开除的女工。起初两天沒事，到了11月28日，有一批青年女同志剛走到这个厂的附近，就遭到工賊改組派的暗算，当场被毒打，并被捉去了14个人（被捉去的人中有一部分是中山大学女生）。晚間，

中山大学学生出城示威游行，又被反动派开枪射击，有一些人被暗的綁去了。到29日，中山大学学生又出城示威，党的省、市委领导同志也参加了，并且是站在队伍前列最危险的岗位上；經過坚决的斗争，冒着反动军队开枪射击的危险，学生队伍与工人在当地聚集的队伍终于汇合了，共达3万人以上，就地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。开始一宣布工会还存在，工会的负责人要来作报告时，全場的工人和工人家屬們都欢呼起来。又过了两天，第一紗厂的失业工人和家屬9 000余人进城請愿，不是走向当时“官厅”請愿，而是走到中山大学去；他們看到中大学生曾經援助工人，以为到中大来就一定能找到他們所要寻找的亲人。有一个中大学生代表組織在三道街公开告訴他們說：会有共产党员来帮助他們、組織他們的。人群中輕声傳說着中国共产党这个庄严的名字。这时，人們改變了愁容，捏紧了拳头，表现出有力量坚决的同敌人战斗。

从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出，广大工人的心都

是向着党、向着革命的，只因机关天天被敌人破获，广泛的联系很难建立，组织领导赶不上去。

单就工人們一心跟着党走的力量來說，是有在武汉举行起义的条件的；只是还缺乏武装斗争的經驗，一些同志們連枪都不会拿，省委的工作就更繁重了，不仅要进行政治教育，还要輪流的教会同志們打枪。

党开始轉入地下活动时，罗亦农烈士还没有走，11月間罗亦农調走，省委的責任就完全落在向警予烈士的身上了。蔡和森烈士当时也調到北方局工作去了。

向警予烈士还主編党刊“长江”；当时还出版有八开的油印报，沒有一定的名称。我曾經把这样的報紙拿去夹在街上閱覽室的报夹上，彷彿還記得那个模样。報紙上有些短小的時評，說得一針見血，鼓舞得人热血沸腾，可能是向警予烈士写的。記得当时散发的各种宣傳品中，还有通俗的“国民党三字經”和“国民党四字經”等。“国民党四字經”是就国民党当时

提出的一些口号編的：上面一句是国民党的口号，下面是我们給它下的定論。其中如“党化教育，欺騙百出”、“忠實黨員，只要洋錢”等語，在外面便可以听到有人在念它。当时散发的一些宣传品当然不都是向警予烈士所写，但总是在她领导下写的。那些东西反映現實及时，分析問題透彻，并有一定的鼓动力量。把这些宣传品拿到工厂区域暗暗的散发时，总会碰到工人悄悄的伸过手来接去。

好些同志是在大革命时期公开过的，容易給敌人找到线索，每每是一个地方的組織剛好有点发展，就由于敌人找到了线索，又給破坏了。

向警予烈士也是公开过的人，并且是很有名声的人。她原来在市总工会工作的地点正靠着“法租界”，轉入地下后，又常住在“法租界”，这就很难免不碰到認識她的人的。但她还是不停的在外面跑，到工厂和学校中去，到处找沒有被捕去的同志接头。

向警予烈士担负省委的工作，不只是领导

武汉的工作，还要领导外县的工作。外县的破获也很厉害，很可能从外县的破获牵扯到省委来，随时都有被发现的危险。省委设在这样一个以“屠杀”著名的城市里，也是不能不叫外县同志耽心的；既耽心省委的安全，又耽心失掉上级的联系。

如果不是有叛徒，单靠国民党的侦查机关是很难破获组织的。“法租界”总共也只几条街，向警予烈士又是有名的人，又时常到处走动，但一直到年关大破坏，反动派还抓不着她。如果不是叛徒宋有龄（宋约龄）报密，向警予烈士是不容易被捕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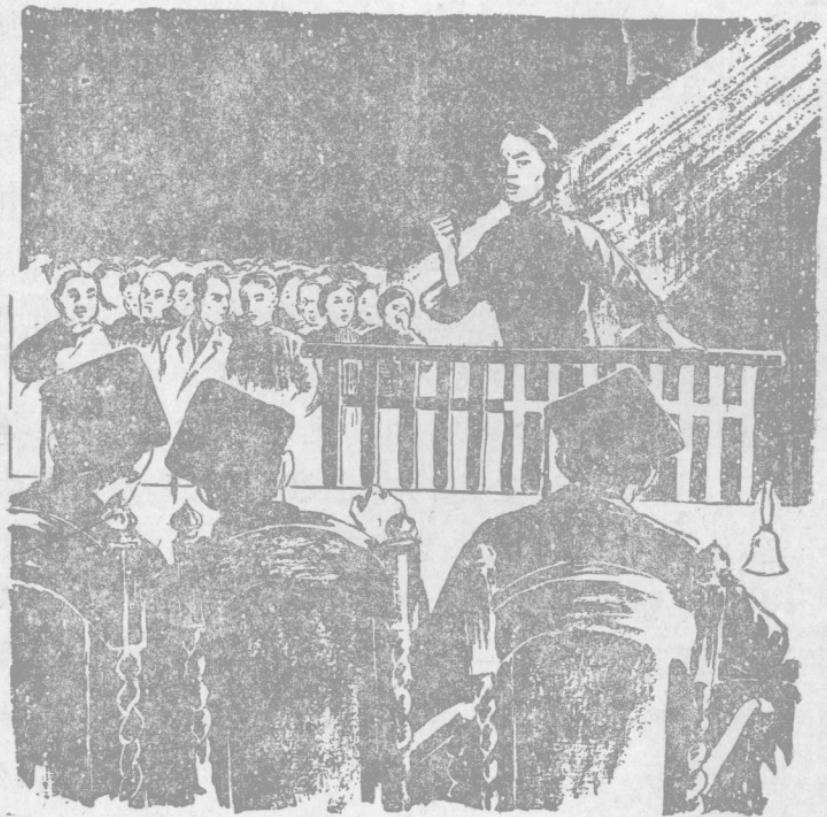
法庭上的抗争

1928年春天，反动派在报上大大夸耀他们的“胜利”：省委书记易陈氏被捕了。报纸上描写了逮捕的经过，原来是叛徒宋有龄去当场指认的，如果没有叛徒指认，就是找到了住处也是捉不到人的。报纸上接着报导出易陈氏就是

向警予，还登出了照片；从照片上看，向警予烈士象有40多岁，这是因为过度紧张的工作和被捕后的折磨，夺去了她的青春，其实她直到牺牲时，也还只33岁。广大革命群众看到了向警予烈士被捕的消息，都非常难过，希望能有一个办法把她救出来。

向警予烈士是被反动派勾结了“法租界”当局逮捕的，开始是关在“法巡捕房”里。现今汉口的中医门诊部地方，便是当时的“法巡捕房”，解放前这里是伪市警察局；在这个房子里，过去不知折磨过多少革命人士。

向警予烈士，在法帝国主义统治下被抓去，这并不是头一次。她是1919年去到法国的，当时她曾经和蔡和森烈士等发起组织“工学世界社”，宣传马克思主义，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民主主义、工团主义等进行过驳斥。1921年2月8日，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在巴黎举行游行示威，提出要读书、要劳动、要饭吃；北洋军阀驻法公使勾结法国政府大加镇压，向警予烈士就被关进过法国的拘留所。



她在法庭上昂头挺胸，慷慨激昂的講革命道理。
每一次“审問”，她都把“法官”說得啞口无言。

这一回又落在法帝国主义手中，在她是更会感到愤慨的；因为这是設在中国領土上的法国监牢。她是一向反对帝国主义者在“租界”上的“治外法权”的。帝国主义“审問”她时，她在法庭上昂头挺胸，慷慨激昂的講革命道理；她揭穿法帝国主义的伪善面目，痛斥“洋法官”无权“拷問”她。她質問法帝国主义为什么要来干涉中国的革命；她引用过去法国革命的例子，說明革命是正义的事业。每一次“审問”，她都把“洋法官”說得哑口无言；法庭倒变成了她宣傳革命的講坛了。她为了对在場的法国帝国主义者直接进行抗爭，有时便干脆講法国話。后来法領事曾經一度不肯把向警予烈士交给国民党，可能就是受到她那一种大无畏精神的感动。

向警予烈士被捕后的一段时间，反动報紙上每天几乎都是把这当头条新聞；反动派以为从向警予口中会得到很多东西，会把共产党一网打尽。她的威武不屈，使反动派那种妄想她“叛变”的得意文章做不下去了；于是報紙上的一